

#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房艳刚, 刘继生\*

(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长春 130024)

**摘要:**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农业型村落的建设将会成为今后的要点和难点。而集聚型农业村落乡村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 使其文化景观演化研究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 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 30 年来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 聚落空间演变经历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 民居景观演变经历了传统四合院、平顶化和立体发展三个阶段; 土地利用经历了圈层化、细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三个阶段。其演化是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等驱动因子影响下产生的乡村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所导致的。未来, 聚落空间的再集聚, 民居景观的现代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并重, 土地利用景观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集聚型农业村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农业村落; 集聚型村落; 乡村文化景观; 景观演化; 可持续发展; 峪口村; 山东省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9)04-0968-11

## 1 前言

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 文化是动力, 自然景观是媒介, 文化景观是结果<sup>[1,2]</sup>。卡尔·苏尔强调文化传统、技术手段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 反对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景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同时指出文化习俗是不断变化的, 随着文化习俗的变化, 文化景观处在连续的变化过程中, 或者被进一步发展, 或者被分解, 或者被替代<sup>[3]</sup>。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乡村文化景观演化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金其铭等认为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sup>[4,5]</sup>。Lipsky Z 认为土地利用数据仅提供景观大尺度的变化, 不能够清晰地阐述乡村景观演变, 反而是微观结构的排列、形状、质量和连通性, 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细微作用才是乡村景观演变中的重要因素<sup>[6]</sup>。刘之浩等认为乡村文化景观虽在一定状态下保持一定的平衡和稳定, 但往往因新的经济因素或外来文化的进入而发生变化, 随着旧的平衡被打破, 又出现新的平衡<sup>[7]</sup>。乡村文化景观是由乡村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形成的, 但自然环境在短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特征, 且表现为被动因素, 因此短时期内乡村文化景观的演化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Isable Mar-

收稿日期: 2008-09-12; 修订日期: 2008-12-10

基金项目: 东北师范大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 (200705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0635030)。

作者简介: 房艳刚 (1979), 男,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地理与聚落地理。

E-mail: fangyg578@nenu.edu.cn

\* 通讯作者: 刘继生, 教授, 博士生导师。E-mail: liuj362@nenu.edu.cn

tioho 在《乡村景观演化中的人为因素》中提出, 传统文化继承、政局稳定、市场发展、社会结构、人口密度和农业技术是乡村景观演化的主要人文因素<sup>[8]</sup>。

改革开放 30 年来, 我国乡村地区的文化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聚落演化方面, 程连生等<sup>[9]</sup>、薛力<sup>[10]</sup>、王成新等<sup>[11]</sup> 分别以太原盆地东南部、江苏省及山东省北公村为例, 探讨了住宅向原聚落四周拓展而致使聚落或村庄空心化的问题; 田光进等<sup>[12]</sup>、龙花楼等<sup>[13]</sup> 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角度分别研究近 10 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与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问题; 吴文恒等<sup>[14]</sup> 以吴楼村为例, 研究了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演变过程。民居景观演化方面, 沙润讨论了气候、地貌与水文、地质与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格局、型式、风格、特色等方面的影响, 并分析了以功利观、审美观和生态观为内涵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自然观<sup>[15]</sup>; 王其钧<sup>[16]</sup> 讨论了宗法、禁忌、习俗对民居型制的影响; 李立<sup>[17]</sup>、何金廖等<sup>[18]</sup> 分别以江南和湘中地区为例, 研究了乡村民居景观的演化过程与动力。土地利用方面, 谢花林等<sup>[19]</sup> 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 研究了乡村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与距离农村居民点远近、气候、土壤和地形的关系; 李小建等<sup>[20]</sup> 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对村庄农业生产区位进行微观研究, 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 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 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 邵景安等<sup>[21]</sup> 以重庆市不同经济类型区的 7 个村为例, 对家庭承包制下农村土地利用特征和农地流转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的看来, 学界对于我国北方地区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研究不多, 主要集中在聚落景观方面, 且以区域性研究为主, 对单个村的系统实证研究不足<sup>[22, 23]</sup>。在人口密集的北方地区, 集聚型村落很多。由于人口的规模效应, 集聚型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收益高, 中心地服务职能强; 同时, 集聚型村落的文化景观风貌, 对其周围小村落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引导性。因此, 未来集聚型村落将在我国传统农区的新农村建设中扮演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 来管窥集聚型传统农业村落文化景观演化的一般过程与机理, 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乡村文化景观的建设与保护提供参考。

##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2.1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案例是山东省曲阜市峪口村, 对于集聚型农业村落的研究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首先, 山东省是个农业大省, 不仅农村人口众多 (占全省人口的 53.9%), 而且农区面积广大 (耕地面积 1.126 亿亩, 占全国的 6.16%); 其次, 曲阜市是代表华北传统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发祥地, 文化景观的传统底蕴厚重, 直到目前曲阜市工业仍不发达, 2006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山东省 21 个县级市中排名第 16 位; 最后, 峪口村历史悠久, 由于地理位置 (离曲阜市 23km, 离其所属吴村镇 4km) 等多种原因,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乡村工业, 农耕一直是该村村民最根本和最稳定的生活来源。峪口村由前寨村、峪东村、峪南村和峪西村 4 个行政村自然集聚而成, 人口密度高、聚落规模大 (2007 年总人口 5766 人, 村落占地总面积为 30.45ha)、有乡村集市<sup>①</sup>。峪口村位于山前冲积平原之上, 有河流从村边经过, 土地肥沃; 气候为温带季风气候, 降水集中在夏秋季节, 春旱经常发

<sup>①</sup>5 天一次, 阴历逢四、九开集, 为方圆 3km 的村庄提供服务; 集市原来位于居中的峪南村, 后因过境主干道路的交通压力迁到前寨村, 但仍与主干道相连 (见图 1-b)。

生, 农作物熟制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2.2 数据来源

文中的社会经济资料由对相关政府部门的调查得来。其他资料来自笔者多年的观察和 2007 年对 60 个农户的访谈。60 个样本农户数量占四个村总户数的 3.7%。其中, 10 户的男性壮年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且长期在家种地, 年人均收入在 3500~4000 元之间; 42 户在过去 5 年中有进城务工人员, 年人均收入在 4000 元以上, 其中工资性收入占 30% 以上; 8 户的男性壮年劳动力虽然长期在家种地, 但仅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年人均收入 3000 元以下; 8 户有在读的高中生或大学生, 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投资。访谈主要包括农户收入与支出、种植作物种类、每种作物的投入与产出、耕地的面积与位置、耕作方式、建设新房的原因与喜好、搬迁的原因与区位、收入来源变化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峪口村文化景观发生明显变化。通过详细深入的实地调研, 发现最近 30 年来该村文化景观的演化主要表现在聚落空间、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 3 个方面。笔者绘制了峪口村 1980 年代、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以来的乡村文化景观示意图 (图 1~图 4), 对各个阶段文化景观的典型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

3 聚落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聚落是住宅的集合体, 而住宅数量与区位的变化, 是由人口空间需求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峪口村聚落空间的演化大致经历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

1980 年代, 随着解放后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大量出生的村民相继进入婚育年龄, 该村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 (户数) 增加迅速 (见表 1), 村民对增加居住空间的需求强烈。1982 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迅速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农民建房提供了资金。因此, 该村外围新住宅的大量建设, 使聚落空间表现出机械型外向扩展的特征 (图 1-a)。

1990 年代,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和子女教育成本的上升, 许多村民生育多胎的愿望已经发生转变, 该村新生儿增速下降。1991 年该村人口达到峰值 6578 人之后, 1992 年转为负增长, 户数增长也非常缓慢。这一时期农民增加居住空间的需求动机, 已经由满足必须的基本生活空间阶段过渡到增加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居住质量阶段。此时, 农民迁居村庄外围的原因, 是基于对迁居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考量。相比原有宅基地的面积和区位, 农民迁居村庄外围获得的收益是居住空间的增加、开阔的视野和到耕地交通时间的减少。对于成本, 程连生等总结提出: 低建筑成本、低移动成本和低土地使用成本是农村聚落空心化的主要驱动力<sup>[9]</sup>。所谓低建筑成本, 指的是在相同建筑结构和相同的工艺水平条件下, 相同建筑面积的单层住宅造价比多层住宅造价要小; 所谓低移动成本, 指的是由于农村聚落规模有限, 农民迁居村庄外围所增加的搬运成本, 供水、教育以及与原来邻里交往的追加成本较小; 所谓低土地使用成本, 指的是由于农民只支付相对较低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费, 致使农户在消费与以往等量的其他全部商品的同时, 能消费更多宅基地。峪

表 1 峪口村基本情况变化表

Tab 1 Changes of some basic data in Yukou Village

	1978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7 年
人口总数	5775	6571	5939	5766
户数	1305	1625	1633	1640
人均收入 (元)	148	1650	2300	3650
聚落面积 (ha)	35.82	44.24	48.09	48.09

口村村民迁居村庄外围的低成本因素与此基本一致。另外，公社解体后，村级政府职能弱化，村庄规划缺乏，宅基地审批不严格，“多一处宅基多一份家业”的传统小农思想，使“一户多宅”的现象明显增加（2000 年四个村空置住宅大约占本村住宅总量的 5~8%）。扩张的低成本和高收益，使许多村民放弃了村内的住宅，在村庄外围建设新房。因此，人口数量的下降和家庭数量的基本稳定，并没有使该村的聚落扩张停止，而是从机械型外向扩展阶段转入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并存阶段(图 1-b)。造成该村聚落空间向外蔓延的原因还有农业结构升级和家庭观念转变。1990 年代初，随着粮食作物收入的降低，许多村民自发转变种植结构，开始大量的种植苹果、葡萄等果树，于是在每家果园里都出现了看护房（图 4 b）。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同以前的大家庭相比，他们更喜欢拥有自己独享的住宅，于是许多老人把果园的看护房建成自己的常年住房，这进一步加剧了该村聚落向外蔓延的程度。

199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随着经济发展，该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了明显改善（见表 2）。村内主干道路由土路变为水泥路，自来水管开始铺设，有线电视网开始架设。1997 年九仙山—峪口—吴村镇—曲阜市的城乡公路客车开通，并迅速增加，2002 年已经达到每天对开 22 班次。由于总人口的减少和外出打工者的增多，基本生活服务设施数量有所减少；同时，代步工具升级、路面硬化使其向城乡车途径干道和集市街道集中，高等

表 2 峪口村商服设施和公共设施变化情况

Tab 2 Commercial, serving and pubic facilities of Yukou Village in 1995 and 2007

		商业服务设施数量与种类	公共设施数量与种类
1995 年	生活类	饭店(1)、综合商店(2)、小卖店(23)、理发店(7)、城乡车(往返 1 班次, 1997 年开通)	学(4)、初中(1)、私人诊所(7)、自来水普及率(无)、有线电视普及率(无)、电话普及率(5%)、硬化路面(1 条)
	生产类	农机修理店(8)、农资商店(8)	
2007 年	生活类	饭店(4)、超市(2)、小卖店(19)、理发店(5)、药房(1)、鞋帽店(1)、电器店(3)、太阳能热水器店(2)、家具店(1)、城乡车(对开 22 班次)	小学(1)、初中(0)、私人诊所(0)、社区医院(1)、自来水普及率(90%)、有线电视普及率(20%)、电话普及率(村内网通话免费)、硬化路面(除胡同外的所有街道)
	生产类	农机修理店(6)、农资商店(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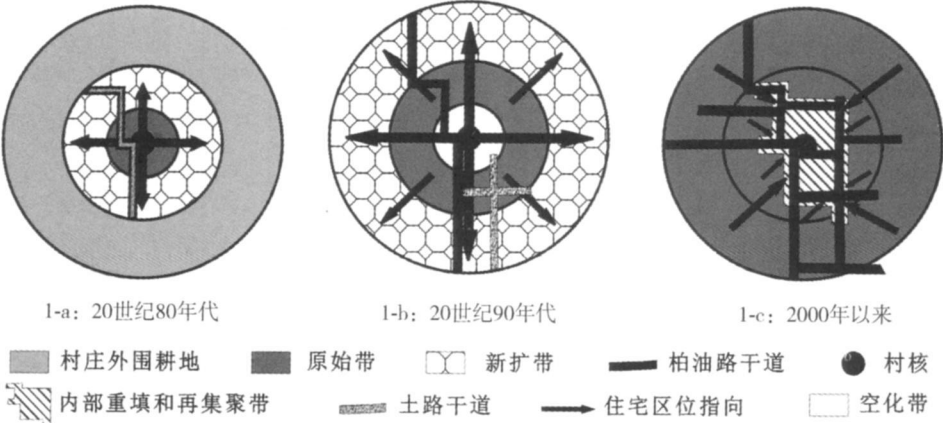


图 1 聚落景观演化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s of settlement structure in each period of Yukou Village

级生活服务设施数量和服务种类增加,其区位的中心性特征更明显。由于学龄儿童的减少,原来的4个村小学合并为1个(由原来居于聚落中心的峪南小学改建而成),初中撤消(位于聚落东北边缘,现已废弃)。这样,村内特别是村中心和主干道两侧的生活便利程度大幅度提高。这一阶段,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出生的男性人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一般多为独生子,且多数以外出打工为生<sup>①</sup>。打工收入的增加和在婚房上的攀比观念,使这一时期的新建住房绝大多数为二层楼房,房屋面积宽绰。同时,因诸多不便,年轻打工族很难把自己的孩子带进城,所以许多老人开始搬回村内居住,以方便照顾儿童,加上果园收益锐减,农地上的看护房大量减少(见图4-c)。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的经历,使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添房置地的传统家业观念有所转变,加上现实需求的变化,使农户对于“一户多宅”的追求明显减弱。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住宅区位指向由接近农田、方便耕作为主,转变为接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方便生活为主。数量不多的新增农户比较容易在村庄内部填空找到合适的住宅区位<sup>②</sup>,有多处宅基地的农户如果原有废宅交通方便,再建住房时也多选择在旧宅新建。加上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和户数稳定,这一时期该村聚落的扩张基本停止,新建房屋多位于村内交通方便之处,尤其以主干道两侧更为明显,从而出现聚落空间内部重填和再集聚的现象(图1-c)。

#### 4 民居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民居体现了人在建设中有永久性和个性的那一部分。人在民居中安置财物、收获品、工具、牲畜、家庭,人按照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建造供每天使用的房屋<sup>[24]</sup>。民居格局、样式和外观的演化特别能反映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1980年代初,峪口村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平均耐用年限为40年。因此,该村民居更新和格局与样式变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住宅本身质量的下降,而是村民住房需求、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变化。

如图2-a所示,1980年代该村民居格局与样式,是传统的华北四合院民居,符合东方特有的风水观念<sup>[25]</sup>。院落整体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大门位于东南方,正房面南背北,两侧为厢房,南面为倒座房,厕所和化粪池位于西南方。大门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为照壁,其功能除给庭院增加气氛,祈祷吉祥之外,也起到一种使外界难以窥视院内活动的隔离作用。正房为三开间,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向外开门,是家人起居会客的地方,兼有餐厅和冬季厨房的功能(因作物秸秆免费,冬季东厢房的厨房仍然使用),也是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边为卧室,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东厢房为储粮室和厨房,人口较多的家庭往往把储粮室改为卧室,而把粮食存放于棚顶之上。西厢房为牲口棚、猪圈,相对简陋,多为棚子或泥草房。倒座房为库房,相对也比较简陋,主要用于堆放农具和杂物。住宅的材质和四合院整体组成,因经济实力的不同而略有变化(如泥草房和三合院)。大门朝向因道路格局变化,有朝南、朝东和朝西三种类型,朝南最多,朝东次之,朝西最少,院落结构布局在方位上也略有差异。实际上,村民对于大门朝南、朝东的偏好,也反作用于道路格局:即东西向道路路网密、胡同多,南北向道路路网稀、干道多。这反映了传统文化观念(包括“风水”观念)的影响。而这一时期,该村数量不多的泥草房和石头

①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买方市场,许多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两者合力使种田比较效益明显降低。加上城市文化快速传播,许多年轻人纷纷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进城打工。

②前寨村和峪西村的小学被住宅填充,峪东村小学因位于村庄边缘而废弃。

房，则反映了当地自然环境对建筑材料的影响。1980 年代初民居的建筑材料是青砖灰瓦，因此民居在外观上以青灰色为主色调。到 1980 年代末，由于建筑材料从青砖灰瓦变为红砖红瓦，因此新建民居在外观上以红色为主色调。但除此之外，新建民居仅正房进深略有增加，院落格局与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屋顶仍为“人”字型（图 3 a）。总的看来，这一时期虽经济收入有所增加，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民居景观虽然外部特征略有差异，但对各种“地方”的安排基本一致，突出表现了住宅是一种适应农民劳动的结晶，对生活职能的满足程度相对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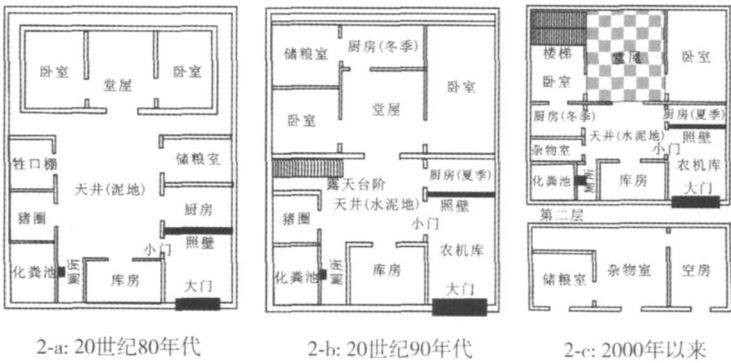


图 2 民居布局演化示意图

Fig 2 Representative folk houses in each period of Yukou Village

1990 年代，随着对居住空间需求的增加，村民倾向于扩大住宅面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畜力在农业耕作中地位下降，于是牲口棚开始减少；同时粮食市场的开放，使农民开始减少粮食的存放。于是，民居整体演化特征表现为，正房开始加宽（进深由原来的 4 ~ 5 米增大到 7 ~ 8 米），相应的牲口棚消失，厨房和储粮室转入正房之中，但因夏季居民仍以薪材作为燃料，所以大部分村民仍然在院中保有一个小的厨房（图 2-b）。同时，大门的宽度以及大门与映门墙的距离变大，以方便驶入、存放手扶拖拉机。这一时期，房屋样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正房开始由原来的“人”字型顶变为平顶（图 3 b）。“人”字型顶变为平顶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水泥钢材渐多，当时的“楼板”生产比较流行，方便建房，满足房屋结构变化需求，美观、耐用、耐火，性价比较好；同时建设“人”字型顶所需粗大主梁因房屋变宽而难以寻找，且木梁上需大量铺垫屋瓦的软物，如芦苇和高粱秸秆，或因捆束费神、或因杂粮地减少而被村民弃用。当然，这一时期仍有大量“人”字型顶旧房存在，居住这种房屋的家庭多数是子女学习优秀，就读重点高中或大学，因学费支出较大，而无力建设新房（子女将来不会回村，所以也不用建新房为子女成家作准备）。同时，这时期天井也由原来的土质地面变成水泥地面。这一阶段民居景观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建筑材料变化以及家庭住房需求差异；农户经济实力和消费结构也是影响民居景观变化的重要因素。

21 世纪初期，该村民居的建筑层数、功能布局和外观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建筑层数的变化是正房由单层变为二层（图 3 c）。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层平顶住房的建筑生态功能比传统的“人”字型顶房屋差很多。“人”字型顶房屋是在长期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冬能保暖，夏能遮阴的功能，因此冬暖夏凉、适宜人居。而新式平顶房，因平顶故夏不能遮阴、冬不能挡风，因水泥顶的导热性好故冬不能保温、夏不能隔

热。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许多村民开始把正房建成二层楼房以解决一层平顶房冬冷夏热的问题。在功能布局上,一楼的储粮室变为楼梯,厨房(冬季)转到已经与正房卧室连通在一起的西厢房中,兼有冬季起居室的功能,还能为卧室取暖,而堂屋面积扩大,除了摆放有祭祖功能的桌椅外,主要用于摆放沙发、茶几等现代家具,是居民夏季的起居活动空间;二楼主要功能是存放粮食、杂物等,不具有居住功能。由于建筑面积增加,空房开始出现(实际上,由于外出打工者数量的增加和夫妻成双外出打工情况的增多,季节性空房更多);同时,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和养殖技能不足的原因,养猪的村民大幅减少,猪圈相应地变为杂物室(图2c)。在平面格局上,整个院落已经完全闭合(即只有屋墙,没有院墙)<sup>①</sup>,东、西、南、北四面房屋不再独立存在,与1980年代初四面房屋围合成院,既实现封闭性和防范性,又宽敞开阔,阳光充足,视野广大明显不同。这反映了建筑材料现代化、盲目攀比居住面积和留守人员不安全感心理对四合院传统内涵的破坏。最后,由于村内打工青年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新建民居外立面和客厅大都贴上了瓷砖。这一阶段民居景观的变化,反映出农民对土地依赖性仍然存在,但正在减小;而国家层面的现代化进程对农民经济收入、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正在成为民居景观变化的主导因素。



图3 房屋立面演化示意图

Fig. 3 Representative building elevation of principal rooms in each period of Yukou Village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居民的收入差异开始扩大,村民更新住房的能力出现了差异,一些因病、因贫或子女教育花费高而经济能力弱的农户并没有更新住房。所以目前该村的民居,在总体是三种主要类型住房交杂分布的状态,这与1980年代初相对单调统一的状态有明显区别。

## 5 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变过程与机理

土地利用景观是人们对一个地区景色的直观感觉中最重要和最多的方面之一。土地利用是人类为了经济社会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生物和技术活动,是土地在人类活动干预下进行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复杂过程<sup>[26]</sup>。乡村土地利用景观既受自然因素的作用和制约,又受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重大影响,在短时期内,人文因子是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0多年来,峪口村土地利用景观发生了较大变化。

解放后,和我国的其他农村一样,峪口村进行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绕村而过的河流上修建了梯级水坝,并开凿了与水库相连的地下灌渠和引水水渠。20世纪80年代初该村的土地质量主要由水利条件决定,可按离村庄的距离由近及远地划分为高质量、中质量和低质量的耕地,三者大致呈同心圆分布。相应地,农地类型从村庄向外依次为蔬菜

<sup>①</sup>东西向干道南侧的民居开始开设面朝街道的后门,以方便出行或经商。

带、谷作带、杂粮-棉花带<sup>①</sup>，在杂粮-棉花带有一定数量的集体经济林地<sup>②</sup>。集体经济的耕作方式，使每个生产小队的耕地呈扇型分布，各队有自己的打谷场(图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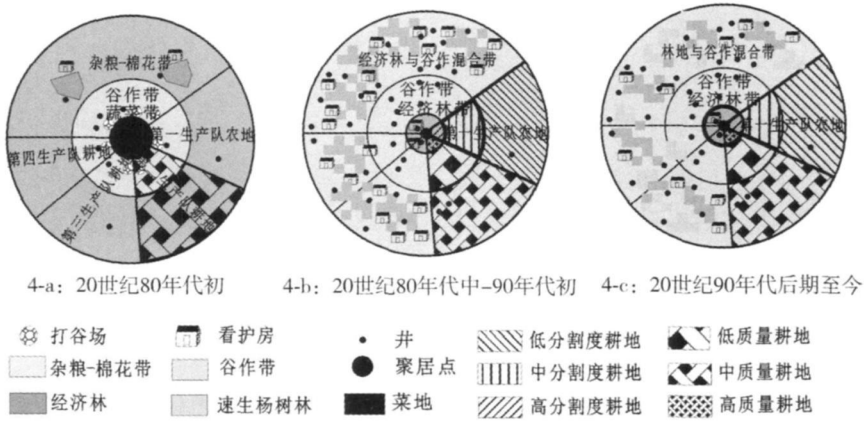


图4 土地利用景观演化示意图

Fig 4 Sketch maps of the evolution of land use landscape

1982 年该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按人分配”的原则，土地按照质量好坏先分级再分块，好坏搭配起来，然后进行平均分配<sup>③</sup>，结果导致该村农地的细碎化。其中，高质量的蔬菜带被分割程度最高（人均仅 0.01 亩），其次为中等质量的谷作带，最后是低质量的杂粮-棉花带。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许多集体生产设施逐渐老化失修，有的甚至消失。水渠被平整为农田，打谷场也被承包大户复垦为农田<sup>④</sup>。然而农户个体建设的自给性生产设施开始大量增加，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水井数量大量增加。因此，该村的灌溉条件并没有因集体水利设施废弃而降低，而是有了大幅度提高。如图 4b 所示，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水利条件变好的杂粮地大都转为谷地，水利条件略有提高的杂粮-棉花地绝大部分转为经济林地（苹果园、葡萄园），使该村经济林地大幅度增加，1989 年达到峰值 3750 亩。同时，许多村民为节约在不同地块之间的交通时间，开始在自家果园种植蔬菜，而原来的分割度极高的菜地则通过承包地的调整变为地块较大的经济林地（离村距离近，交通成本低、看护方便，加上原有灌溉条件好，土壤肥力高使其成为经济林地的最好区位）。谷地没有转为经济林地的原因，一方面是该圈耕地的分割度太高，人均仅 0.37 亩，难以满足经济林地的规模需要；另一方面是该圈耕地为口粮田，有为国家上交公粮的任务。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该村土地利用的整体结构大致具有以下特征：内圈——经济林带、中圈——谷作带、外圈——经济林地与谷地混合带。随着农地利用主体由生产队变为个体农户，作物种植的自由度提高，各个圈层都有其他圈层的用地类

①农业土地利用的圈层结构具有一定普遍性。与杜能圈不同，村落农业土地利用圈层结构的主要形成因素是基于作物劳动强度的交通成本和耕地质量。一般而言，离村近的耕地以种植需要劳动量大、往返次数多的蔬菜为主，向外依次为需要劳动量中等、往返次数中等的谷物和需要劳动量与往返次数最小的杂粮地。土壤自然肥力影响到作物的种植类型，但在我国北方地区因春旱时常发生，水利条件明显影响耕地质量的高低。由于峪口村村落选址于河流附近，从而使农田水利条件表现出从村庄向外围变差的特征，相应的耕地类型也呈现出类圈层结构（棉花虽需要劳动量较多，但因耐旱故布局在杂粮带）。由于人类会有意识培养肥力，蔬菜带、谷作带和杂粮-棉花带的耕地质量差异会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

②前寨村和峪南村以苹果树为主，峪东村和峪南村因离山近坡地多，以枣树、杏树、山楂树为主。  
③实际分配方案相当复杂，耕地质量被划分为五级，耕地类型被分为口粮田、棉花田、经济田和菜地，耕地地权被分为农户责任田、村承包地和小队承包地。  
④打谷场消失的原因，一是农业机械化使其打谷功能消失，二是住房平顶化和天井地面水泥化使其晒谷功能消失。



型; 但由于该村多数农户经营的农业结构类似 ( 种植果园和粮作) 且基本都有不同距离的微地块, 使得该村农业布局仍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征。水利条件的普遍改善, 使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决定因素变为农家肥和化肥使用量的比重。因农家肥可大幅度提高经济林地的收益 ( 由于自家农家肥量有限, 许多农户从养殖场购买有机肥), 所以内圈和外圈经济林带的耕地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中圈——谷作带的耕地质量, 因农家肥使用量的减少、秸秆焚烧和化肥使用量的大量增加, 土壤养分平衡被破坏, 土地贫瘠化普遍发生。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 因全国范围的农产品过剩和农资价格提高, 无论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物, 收益都有较大下降。其中经济林地因大量盲目发展, 收益更是大幅下降。村民纷纷外出打工, 因人力投入的减少, 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开始下降, 农业经济结构也相应调整。从图 4-c 和表 3 可以看出, 水利条件较好经济林地大量转变为谷地, 部分水利条件一般的谷地和经济林地转变为普通林地<sup>①</sup>。这一时期, 因农业投入的停滞, 耕地质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一阶段, 农地地块数量逐步减少, 单块面积有所增加, 土地利用向规模化和集中化方向发展。产生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 3 个方面: 一是随着打工人数渐增, 土地转包开始出现并呈增加趋势, 目前转包面积大体占总耕地的 5%; 二是农民所分得的土地除口粮田外, 棉花田、经济田和菜地又都重新收归大队, 由大队统一承包 ( 价格与农户转包价格大致一样); 三是农户为节约交通时间而自发进行地块互换。

表 3 2007 年各村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Tab 3 Basic demographic and socio economic data of Yukou village

	人均收入 (元)	人均耕地 (亩)	标准宅基地 面积 (m <sup>2</sup> )	果园面积 (亩)		杨树林面积 (亩)		人口	户均外出 务工人数
				1990 年	2007 年	1990 年	2007 年		
前寨村	3500	1.52	13×14	450	300	0	220	1675	1.21
峪东村	3300	1.65	13×14	800	400	0	100	1270	1.16
峪南村	4000	1.47	15×15	1000	800	0	160	1531	1.38
峪西村	3900	2.17	16.5×15	1500	1800	0	100	1290	0.93

6 结论与讨论

聚落空间、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是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内容。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改革开放后, 我国传统农区集聚型村落的文化景观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 聚落空间演变经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民居景观演化经历了传统四合院 ( “人” 字型顶)、平顶化和立体发展三个阶段。土地利用景观演化经历了圈层化、细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三个阶段。

(2) 短时期内乡村文化景观演变, 主要受人文因子的影响。在宏观层面, 其景观演化主要受城乡关系、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微观层面, 聚落空间的演变主要受村落人口数量、结构和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观念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农业生产方式、区域自然环境是民居景观的基础性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特别是非农收入增加, 经济实力、农户需求多样化、社会文化心理和技术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增加; 土地利用景观受自然环境本底的影响, 短时期其变

<sup>①</sup>四个村中, 仅峪西村的果园面积有增加, 但实际苹果园和葡萄园面积也大量减少, 新增果园以核桃村、山楂树为主, 所需人力投入比较少, 且因对适宜地形的要求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小。峪东村虽然坡地也较多, 但承包地的经常调整, 使枣树林、杏树林面积大量减少。

化的驱动因子主要是离村庄远近、农地生产条件、农地制度改革和由于市场、政策、技术而产生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经济效益的变化。

(3) 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增加、交通工具的换代升级和乡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 再集聚可能会成为集聚型传统农业村落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乡村景观保护和村镇规划的加强, 以及节能建筑的推广, 民居景观可能会出现现代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并重的趋势。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可持续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程度的提高, 未来土地利用可能会出现规模化、集约化和生态化趋势。

上述结论对我国乡村文化景观建设有参考意义, 但须指出的是, 部分结论与研究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不无关系。例如, 农业结构调整对聚落扩展的影响, 可能仅适合于本文的实证区域, 而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本研究得出结论, 还有待通过其他区域的个案研究进行验证。如何合理引导乡村文化景观的演变趋势, 促进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塑造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1] Sauer Carl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 19 ~ 54.
- [2] Larkin Robert P, Peters Gary L.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224.
- [3] 邓辉. 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 地理研究, 2003, 22(5): 625~ 634
- [4] 金其铭. 农村聚落地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86~ 89.
- [5] 金其铭, 董新, 张小林. 乡村地理学.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100~ 150.
- [6] Lipsky Z. The changing face of Czech r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1(1): 39~ 45.
- [7] 刘之浩, 金其铭. 试论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 17(4): 120~ 123.
- [8] Isable M artioho. Historic anthropogenic factors shaping the rural landscape of Portugal's interior alenteio. Arizona: Arizo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4.
- [9] 程连生, 冯文勇, 蒋立宏. 太原盆地东南部农村聚落空心化机理分析. 地理学报, 2001, 56(4): 437~ 446.
- [10] 薛力. 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规划, 2001, 25(6): 8~ 13
- [11] 王成新, 姚士谋, 陈彩虹. 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 地理科学, 2005, 25(3): 257~ 262
- [12] 田光进, 刘纪远, 庄大方. 近 10 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 地理学报, 2003, 58(5): 651~ 658
- [13]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 地理学报, 2005, 60(2): 179~ 188
- [14] 吴文恒, 牛叔文, 郭晓东, 等. 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演变的实证分析. 地理研究, 2008, 27(5): 1017 ~ 1026
- [15] 沙润.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渊源. 地理科学, 1997, 12(3): 25~ 29
- [16] 王其钧. 宗法、禁忌、习俗对民居型制. 建筑学报, 1996, (10): 57~ 60
- [17] 李立. 乡村聚落: 形态、类型与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例.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07~ 176.
- [18] 何金廖, 宗跃光, 张雷. 湘中丘陵地区乡村文化景观的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30(4): 94~ 98.
- [19] 谢花林, 李波.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2): 294~ 304
- [20] 李小建, 高更和.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地理科学, 2008, 28(5): 616 ~ 622
- [21] 邵景安, 魏朝富, 谢德体. 家庭承包制下土地流转的农户解释: 对重庆不同经济类型区七个村的调查分析. 地理研究, 2007, 26(2): 275~ 286
- [22] 尹怀庭, 陈宗兴. 陕西乡村聚落特征及其演变. 人文地理, 1995, 10(4): 17~ 24.
- [23] 冯文勇, 陈新莓. 晋中平原地区农村聚落扩展分析. 人文地理, 2003, 18(6): 93~ 96.

- [24] 阿·德芒戎. 人文地理学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249.
- [25] 俞孔坚. 景观: 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30~ 50.
- [26] 甘红, 刘彦随, 王大伟. 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人文驱动因子模拟分析. 资源科学, 2004, 26(2): 88~ 93.

## Cult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of cluster agricultural village: The case of Yukou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FANG Yangang, LIU Jirsheng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advancing proces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villages will become the cruces and nodus. Owing to the representative and demonstration of its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cluster agricultural villages deserve to be studied. Taking a case study of Yukou Village, Sh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cluster agricultural village has approximately changed over three sta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ts settlement evolu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mechanical expansion, sprawling expansion & hollowizing, and refilling & recentralization. The landscape evolution of its folk house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traditional quadrangle, one-storyed flattop and multistoried building. The landscape evolution of its land use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circled stratification, fragment & intensive cultivation, and concentration together with extensive cultivation. The short-term cult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of cluster agricultural village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human factors. The macro-scoped factors include urban-rural relatio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system of family planning and farmland usufruct, and governmental policies. Concretely,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is affected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lanning, manage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as, and agricultural structure. The production way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folk house. However the influences of household income (especially non-farming income) and demand, socio-cultural idea and mind, and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land use is restricted by natural factors. The short-term driving factors of its evolution include the distance to villag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facilities, the land system, and the profit changes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In the future, the recentralization of settlements will become the trend; the folk house will show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cluding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trend, and individualization; scaled, intensive,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are likely to be the tren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village; cluster village;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evolu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ukou village, Shandong province